

● 美国文学史论译丛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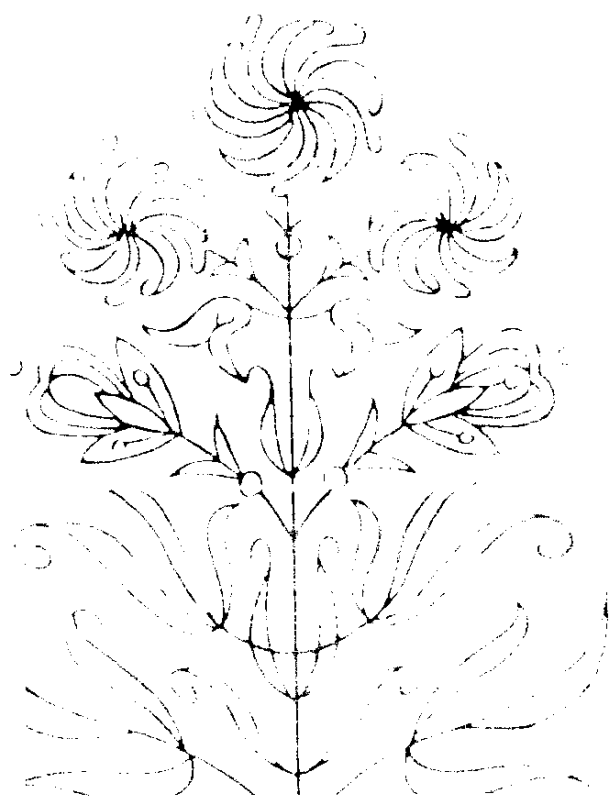
PATRIOTIC GORE

爱国者之血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文学

[美] EDMUND WILSON 著

胡曙中 王竞 夏平 等译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沪)新登字 203 号

Patriotic Gore
Studies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by
Edmund Wilson

Copyright© 1962 by Edmund Wilson.
Copyright© Renewed 1990 by Helen Miranda Wilso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with permission of Farrar,
Straus, and Groux, Inc., 19 Union Square West,
New York, NY 10003,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爱国者之血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文学
胡曙中 王 竞 夏 平等译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外国语学院内)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欧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23.5 印张 586 千字
1993 年 4 月第 1 版 199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7—81009—713—X/I·054
定价: 9.50 元

前 言

美国南北战争并不是一个文学繁荣昌盛的时期。可是，在这一时期内，毕竟还是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其中以讲演、时事评论、私人信件、日记和回忆录以及新闻报道居多。1861年至1865年之间那场大规模的历史危机中，涌现出如此众多，如此能说善辩的人材，这也许还找不到其他的例子吧？查尔斯·萨姆纳的演说词藻华丽，使人想起迪莫司森斯和西塞罗的风格；林肯的讲演别具一格，有时是指令，有时又是挽歌；约翰·布朗的遗作，既有狱中的书信，又有法庭上的最后辩词；格兰特的回忆录文笔精炼、清晰透彻；而约翰·莫斯比的自传却近乎是冒险小说；除他们两人以外，对峙两军中其他许许多多的军官也留下了记载和自辩；玛丽·切斯纳特的日记脍炙人口，比大多数受这场战争感染而写下的小说更富有想象和启示；亚当斯兄弟的自传是由一个具有历史责任感的家族的第四代成员写成的。虽然自传写得缺乏情感，却也称得上颇为精辟的时评。上面提到的这些文献戏剧化地再现了这场战争，胜过了任何诗人和小说家的作品。这场戏剧已经落下了帷幕，出场的人物用笔录下了各自演出的那一部分。这些文学作品具有一种奇特的吸引力，促使人们不停地往下阅读。这很像布朗宁的《戒指和书》：九个不同的人物从各自的角度叙述同一

个故事。我们在切斯纳特夫人的日记里读到胡德将军对美女子“巴克”·普雷斯頓的不幸热恋；在谢尔曼的回忆录里，我们又一次读到了胡德抗议北方入侵者在攻占亚特兰大市之后所采取的严厉手段的记述，以及他同谢尔曼之间进行的论战；后来我们又发现，胡德自己也写过回忆录。费城的黑人教师夏洛特·富顿和波士顿的婆罗门托马斯·温特沃思·希金森曾分别详尽记叙了他们在南卡罗来纳海岛上一起度过的那段时光。同林肯合伙开过律师事务所的威廉·赫恩登，加入美国籍的法国人钱布朗侯爵，南部邦联的副总统亚历山大·H·斯蒂芬斯，以及青年上尉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等人都写过林肯，可是在他们各自的笔下，林肯的形象却全然不同！在亨利·弗朗西斯·亚当斯和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的笔下，格兰特简直判若两人！每个人的谈吐，风度都是那么合乎自己的身份，也许在19世纪，这要比在我们的这个时代更显得自然些。而如今，我们读起来却有闻声见人的感觉。当我们读到麦克莱兰在拜访解除他总司令职务的亨利·W·哈勒克回来，从前线给妻子的家信中说的：“他是一个 bien mauvais sujet*——他不是正人君子，”那段话时，我们会感到好笑，这并不亚于当有人问到福雷斯特将军他如何在默弗里斯巴勒获胜时，他的那段回答：他抄了一条近路，“跟大多数人一起首先到达。”

本书描述的30多位男女人物都曾经历过这一场南北战争。他们有的在战争中起到过某种特殊的作用，有的则非同寻常地遭遇过战争的冲击，他们都从某个角度或在某个侧面记述了自己的战争经历。笔者在介绍这些人物的时候，着力于阐述他们同其他人的直接关系，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和地位的价值，尽力避免一般化的描述，而通过展现他们所从事的事业以及他们所特有的性格让人受益。不过，在这里，还是应该先向读者解释一下使我形成对

* 译者注：bien mauvais sujet——法语，意为“很坏的人”。

这场战争看法的总的立场观点。

我亲身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也读过一些历史。因此，我再也不会当真相信任何一个国家自我标榜的那些“战争目的”了。我认为历史学家和政论作家都有一个很大的缺陷，那就是他们往往对生物学以及动物学的现象不感兴趣。最近有一部沃尔特·迪斯尼制片厂拍摄的有关海底生物影片，描绘了一种叫海参的原始生物体如何用身体一端的洞孔吞噬另一种比它小的生物体；哪怕它碰上的是另一只海参，只要身体比它略小一点，它也会把它大口大口地吞食下去。一般来说，人类之间进行的战争通常也主要是由像海参所具有的那种贪婪本性所引起。除了人以外，在动物界里实在难以找到一种动物具有人类所发生的那种有组织的侵略行径。也许只有兵蚁才掌握可以与之媲美的技能。狒狒是成群结伙地行走的，小鸟会联合起来抵抗猫头鹰，而蜜蜂保卫自己的蜂窝则是它们的本能。在哺乳动物中，与人类相似的大猩猩也许是最不好斗的，它们以家族为单位生活在一起，从不骚扰别人的家庭；然而原始人就不一样，有证据证明，他们不得不以战斗的方式来保卫自己的家园。通常，所有的动物都以其它的生物为食，无一例外，只要是能够捕捉到的，就一概吞食，而且又总是那么贪得无厌。在这方面，人同其他动物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人类成功地精心编造了一套所谓的“道德”和“理由”，用“美德”和“文明”来证明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无可非议的。因此，人在准备攻击并吞噬别人的时候，总要事先自我标榜一番，歌颂荣誉和上帝，侈谈民族的理想，引证逻辑上的大道理。一旦战争开始，这些自我标榜就失去了它们的本来意义，再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了。本世纪德国人曾经是一种赤裸裸的侵略扩张行径的代表。他们在1914年的战争中入侵法国和比利时，藉口是需要生存空间，完成传播德国文化的使命。凡尔赛条约对他们的惩罚本来是要使他们丧失战斗能力的，可是

后来却激发他们再次在欧洲横冲直撞。他们自称是肩负着管辖全人类使命的“主宰民族”。然而，如果一个民族革命刚刚成功，情况就略为复杂了。这样一个民族所呼喊的口号起初也许表达了某一社会集团或国家的得意洋洋的情感，因为它成功地摆脱了一直在吞噬着自己的另一个社会集团或国家的枷锁；这些口号同时也喊出了革命者对将来建立一个比较自由幸福的社会所抱的热切希望。革命也许是以内战开始的，过去处于统治地位的势力被击溃推翻之后，新政权意识到，为了防止旧政权的卷土重来，就必须捍卫革命所建立的新社会。旧政权可能会得到与它目标一致，政局依然稳固的其他政权的支持。然而，当革命势力在建立起自己的权威以后，感到自己已经强大到无所顾忌的地步的时候，它就会敞开肚皮去吞食别人，而原先的口号所具有的意义就不复存在了。法国人起先是捍卫自己的革命，后来发展到拿破仑的远征；俄国人起先同样是捍卫自己的革命，后来演变到贪婪的扩张，它一边愤怒地谴责“帝国主义”，一边吞并了巴尔干半岛和波罗的海诸国以及若干中欧国家。这种做法同当年沙皇俄国时而采用和平手段，时而采用非和平的手段吞并无数民族，建立起昔日的俄罗斯帝国的做法简直没有什么两样。拿破仑时代的法国人高唱“荣耀”，正像他们当年高唱“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理想一样，而他们的《马赛曲》在两种场合都起到了同样的作用。俄国人一向把自己装扮成是推动无情的历史进程的工具，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是拯救世界，所有其他的国家都变成“人民民主国家”。再拿我们美国人来说，我们的先辈革命成功了，作为后代的我们感到自命不凡，可是我们同样受到了扩张心理的驱使，所不同的是，我们接过了别人好战的虚伪口号之后，又添加上了“美国之梦”、“美国生活方式”以及“捍卫自由世界”等等诸如此类的口号。

然而，要我们承认我们也在吞噬别人，我们也在侈谈虚伪的口号，这当然是很不容易的。如果我们要真正理解我们国家在当今

时代所起的作用的话，我们必须回顾一下过去，客观地看一看我们以往的发展历史以及我们以往的所作所为。

正像现代法国和苏联一样，我们推翻了君主统治势力，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嗣后，扩张的进程就开始了。在一段时间内，我们的扩张手段倒也相当和平。当然我们同印第安人的斗争属于例外，这方面我以后还要谈及。我们从法国人手里买下了路易斯安那州，从西班牙人手里买下了佛罗里达州。至于得克萨斯州，当它还是西班牙统治下的一个墨西哥省份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往那里移民定居了，我们要把它从墨西哥人手里买下来，可是墨西哥人不干。最后还是美国的移民把墨西哥人赶了出去，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后来又变成了美国版图中的一部分。对付英国人时，我们同他们达成协议，把俄勒冈准州接管过来；可是在对付比较无能的墨西哥人时，我们则继续施加高压手段。在墨西哥革命中，美国人曾蒙受了财产的损失，有的美国人在墨西哥遭到枪杀。对此，我们向墨西哥索取高额赔偿。我们提出，如果墨西哥人愿意割让他们在格兰德河以北的那部分领土，我们就放弃这一债权。我们声称这块土地应该是得克萨斯州的一部分；我们还试图把加利福尼亚也买下来。当时加利福尼亚是墨西哥的一部分，可是，来自美国的拓荒者已经在它的北部定居下来。墨西哥人拒绝了这两项要求，波尔克总统便诉诸武力，派兵占领了格兰德河以北的地区。墨西哥人为捍卫自己的疆土进行了抵抗，于是美国就宣战，入侵墨西哥，攻下首都，武力占领了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亚以及整个荒无人烟的西部，把一半以上的墨西哥领土攫为己有，墨西哥政府被迫同我们签订和约。双方达成了协议，由美国支付墨西哥 1,500 万美元，作为攫取土地的赔偿，同时取消催逼墨西哥偿还的债务。下面一段话摘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小说家兼时事评论员威廉·吉尔摩·西姆斯致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詹姆斯·H·哈蒙德的一封书信，从中可以看到当时为墨西哥战争辩护的那种思想情绪。信中写

道：“你不应该过分谴责军人的荣耀。战争是现代文明中一个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的命运就是去征服别人。一个国家一旦停止扩展它的统治势力，它就会沦为虽处劣势但却富有生气的邻国的牺牲品。墨西哥人的处境正如谚语中所说的那样：上帝要毁灭他们，就先使他们变疯，他们竭尽全力迫使我们去征服他们，如今的情况也只能如此，别无其他的选择。请记住我的话——我们的人民绝对不会放弃他们所赢得的任何一寸土地。在这方面，他们无疑和他们的盎格鲁—诺曼人祖先是一脉相承的。也许我们愿意出钱赎买，可是这笔钱的来源只能是被征服的国家支付给我们的赔偿金额。”

下一步是对南方各州的镇压，当时它们企图脱离联邦，建立自己的共和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提一下加拿大人的情况：他们对华盛顿政府日益加剧的侵略性惊慌不已，于是就着手巩固自己分散的省份，建立起一个单一的联邦制度。蓄奴的南方各州同迅速工业化的北方这时已变得迥然不同，它们实际上已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了；作为两个抗争的集权单位，他们犹如两个欧洲国家，都想把自己的势力扩张到对方。促使华盛顿政府采取行动防止南方脱离的动机并非人们一向所认为的那样。它为解放黑奴而战的神话如今已牢牢地在南方以外的各地美国民众的头脑中生根；诚然，南方各州的奴隶问题确实使许多人——不管在南方还是在北方——感到难堪；可是很多人——不管在北方还是在南方——对奴隶制还是赞同的。惠蒂尔和加里森这样的废奴主义者，如果身处南卡罗来纳州，倒也不一定会遇上什么致命的危险，可是他俩都是在新英格兰遭到暴徒袭击的。前者在费城办的一家报馆还被一烧而光。反对南方的共和党人对付这些狂热分子是相当谨慎的。后来，种植园主的恶行被充分利用而加以宣传，这有点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所谓德国人在比利时的暴行被用作宣传一样。此时，北方各州的奴隶制度都已废除，从而为好战的北部联邦提供了煽

动性的道义依据。在每一场现代战争中这样的宣传都是必不可少的，它使冲突显得像一场情节曲折的戏剧。至于脱离联邦的罪行，其实，新英格兰本身早在 1812 年战争期间就曾经考虑过脱离联邦的问题，那时它同英国的贸易已经中断。可是这些用来煽动深仇大恨情绪的虚伪道义依据对北方来说从来不是基本的东西；华盛顿政府可以以它所能调动的优越装备以及杰出的组织能力来胁迫并压服南方，根本不必夸夸其谈什么事业正义的大道理。

北方决心维持联邦只不过反映了当时争权夺利所采取的形式而已。在 19 世纪，统一的要求是强烈的，它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如果我们要联系当今历史来看南北战争的意义的话，我们应该把亚伯拉罕·林肯与其他从事过类似活动的领袖人物放在一起评价。这些领袖人物中主要有俾斯麦和列宁。俾斯麦、列宁和林肯领导了三个新的国家的统一。如果我们属于某一个阶级，或者由于生活在世界某一地区而使我们有理由崇敬其中某个政治家，然而却遭到另一个政治家政策的伤害的话，我们可能会感到把这三个人放在一起有些出人意外。俾斯麦打败了法国人，并使他们蒙受了耻辱，因此遭到他们的憎恶。憎恶列宁的人也很多，有旧政权的俄国人，有被苏维埃政府宣告非法的政治异教徒，也有那些被“共产主义”吓坏了的人，他们把共产主义视为传统的自由竞争经济政策的大敌（这种自由竞争经济政策今天很难说还存在于任何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林肯为美国南方人所憎恶，他发动了一场针对他们的 4 年战争，并迫使他们无条件投降。可是这三位领袖人物中的每一个在忠于他所建立的国家的人民心目中却都是英雄。（我还记得幼年时到弗吉尼亚州的亲戚家作客，听到他们把林肯称作“残忍的暴君”时，我是多么地惊讶。）这三位领袖人物有一些相同的品质。林肯、俾斯麦和列宁都是智力超群、性格坚韧的人物，他们富有历史想象力，这种想象力是同顽强的意志结合在一起的。他们是各树一帜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把理想看得高于一切。

切。他们三人都喜欢独来独往，一生致力于自己的事业。他们都不喜欢蛊惑人心的宣传，也不喜欢摆浮华的官架；甚至连俾斯麦也抱怨说他无法当一名宫廷大臣，并向格兰特等人保证，他实际上并不主张君主制度，而是拥护共和政体的——他心里必定也是这么认为的。他们三人都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统治着过去一向松散地结合在一起的各个民族。林肯迫使南方屈从于北方，从而保持了联邦的完整；俾斯麦把具有聚合力的普鲁士霸权主义强加于德国各州；列宁本人非常厌恶官僚主义，他无法想象，旧秩序被推翻之后还会有什么正派的人想当官僚。然而他却着手把俄国连同它遍及辽阔国土无数的少数民族一起结合在一个严密的官僚主义大网之中。这三个领袖人物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历经种种风险，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林肯被同情南方邦联的分子刺杀了，当时他就职总统刚过4年。列宁掌权的时间并不比林肯长多少——7年多一点：他受到一名政敌枪击，此后他连续中风数次，使他在担任政府首脑的最后两年中几乎完全丧失了能力。俾斯麦并未遇刺，可是社会革命党人两次图谋刺杀他的皇帝。所有这些暴力行为都准确地说明了他们为要达到目的所进行的或应该进行的镇压的分量。这几个政治家都坚信他们的行动是受到远比他们个人强大得多的某种力量所支配的。俾斯麦相信上帝，并认为他的每个胜利都是由于受到神灵的启示而取得的，在那些时刻他看到了上帝指引的方向；列宁相信“历史”，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来说，历史已经变成了耶稣教宣扬的天意的一种取代物；林肯有时会像列宁那样谈论历史，有时又会像俾斯麦那样谈论上帝，他总是像列宁那样非常清楚自己在人类发展的戏剧中所担负的那种举足轻重的角色的使命，不过，他又与列宁不同，他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平凡的人，而列宁却自命为辩证过程中的“对立面”，他从事地下工作时隐姓埋名，后来似乎没有再想到自己是个名叫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的俄国人。

这三个人都通过他们所行使的权力施加压力，使自己成为不妥协的独裁者。他们的继承者都以一种愚蠢、暴虐、肆无忌惮的手段继续行使这种权力，操纵由他们统一起来的各个民族。因此，他们首创的各种政策的所有潜在恶劣因素在他们死后都以一种令人无比厌恶的方式体现出来了。林肯宽宏大量重新接纳南方加入联邦的计划被激进的共和党人废弃了。他们对蒙受惨败而苦不堪言的邦联以各种方式加以侮辱和损伤。俾斯麦死后上台的那个君主在位期间亲历了德国的战败和崩溃，后来根据要求流亡国外，使德国陷于困境，最后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个更糟糕的政府，出现了一场更蛮横的侵略战争，遭到了一次更为悲惨的失败；列宁早在去世之前很久就已经被斯大林所取代，斯大林消灭了老布尔什维克中的理想主义分子，以一种使法国大革命显得小巫见大巫的恐怖手段统治并折磨着俄国人民，让他们遭受了外国入侵，从而使他们国家的整个西部遭到洗劫，还断送了 700 万人的生命，而在这之前，斯大林就已经使几百万人丧生。我们美国人至今还未曾经历过德国和俄国那种独裁统治以后所接踵而来的巨大灾难，可是长期以来我们一直稳步地朝着同他们一样的方向在发展。匈牙利最近出现了一场反叛，它的命运同我国南北战争之后南方所遭受的命运相比较究竟有何不同之处呢？俄国人野蛮地镇压了这次动乱，企图使匈牙利人屈服，就像我们当年对南方人的所作所为一样；俄国人可以像我们一样为自己辩解，宣称他们被迫去镇压的那个集团是个停滞不前的封建社会，其经济已陷于瘫痪，而这种经济是建立在社会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

这些现代联邦大国喋喋不休地谈论什么：“帝国主义”的恐怖，苏联这么做了，我们也同样。这些大国一直处于极度的紧张状态，因为被他们所征服的集团总是不愿意顺从。他们一反抗，官僚中央政府就立即予以镇压，而且这种镇压比起过去的君主皇帝来，往往要悄然得多。在谈到美国的扩张问题时，我并没有花很多篇幅

讲述我们是如何把印第安人从我们本来答应让他们居住的土地上赶走的。总的说来，我们把这个令人感兴趣的民族驱赶走了，欺骗、屠杀了他们，并使之丧失了斗志。大事告成，我们也就很快地把他们忘记了。然而，就我们所知，如今在北美，印第安人的人数同哥伦布来到这里时大致相等。这些最早的本地人至今仍然不认为自己是属于美利坚合众国的。他们不愿当美国公民，他们一直在抵制为了修筑公路和建造发电厂而夺走他们土地的企图。可是在当今中央集权时代，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别处，这种工程项目往往比任何个人利益或地方利益更为重要。印第安人一直在引用过去同我们的政府签订的条约——这些条约毕竟都是在并不那么遥远的18世纪末签订的。可是我们却敢于对这些条约不屑一顾，其原因委实也难以启齿，无非是由于我们都明白，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可以动用法庭、警察，必要时，甚至军队。区区几百或几千个印第安人要想抗争是绝无可能的。如今，纽约州和加拿大的易洛魁印第安人已经组织起一个民族主义运动了。在我写这篇前言的时候，一个来自美国各地的印第安人代表大会正在芝加哥举行。大会发表了一项宣言，要求联邦政府提供更多的住房、教育和卫生援助，并要求把印第安事务局的权力移交给印第安保留地的负责人。他们认为印第安事务局对他们不甚了解、不够关心，而保留地的负责人能了解他们的需要，也能使他们直接向华盛顿政府反映问题。在发生这些事的同时，我们自鸣得意，陶醉于如何对蒋介石这个被唾弃的中国国民党人讲信义，在我们的扶持下，此人在台湾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我们还在老挝以及其他遥远的国家挥霍好几亿美元，其理由却无比的荒唐。这种做法实在是愚不可言。据说我们抵抗共产主义是在捍卫人们的“自由”，而这些人又往往如同我们在国内不断予以折磨的印第安人一样的原始。

迄今为止，印第安人的东山再起看来还是绝无可能的。我们还没感到有必要去加以理会。可是最近在南方，要求学校取消种

族隔离的斗争相当激烈，而且又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以致我们不得不予以认真对待。这一事件中涉及到两种相互对立的问题，因而要北方人像往常那样简单地说正确与错误是不现实的。黑人在反抗白人，白人像以往一样害怕黑人。白人并不想让他们改善自己的地位，因为他们不愿意使自己处于不得不同他们竞争的地位；然而，南方的白人本身又是反联邦政府的，因为后者使他们田园荒芜，并蒙受战败的耻辱，而且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的重建过程中又对他们横加干涉。凡此种种使他们一直耿耿于怀。他们从来也没有真正地承认过华盛顿政府的权威。对于黑人和白人持同样的同情态度是可以做到的，不过白人为了反对取消种族隔离政策而采取了流氓犯罪的手法则不能予以同情。那种做法使主张非暴力的黑人领袖们处于道义上的优越地位。再打个比方也许会有好处：据说荷兰血统的白人在南非野蛮推行种族隔离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在“帝国主义的”布尔战争中败在英国人的手下，蒙受了奇耻大辱，于是就冲着任凭他们摆布的黑人出气。而被打垮的南方邦联的白人则拿他们周围的黑人出气。为了防止白人采取暴力行动，联邦政府派遣部队护送黑人儿童去白人学校上学。这使南方人回想起了火烧亚特兰大城的情景，回想起北方军毁坏南方人家园的情景，回想起掌权阶级是如何被剥夺公民权以及黑人是如何过早地被赋以公民权的情景。事实上，自从南北战争以来，南方同华盛顿政府的关系，就像匈牙利同莫斯科政府以及乌克兰同莫斯科政府的关系一样，一直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林肯尽管有点犹豫，但还是作出了反对南方脱离联邦的决定。是他迫使南方彻底投降。可是在这之前他并不赞成墨西哥战争，在国会他拒绝批准这场战争。看来他很少考虑如何进一步扩张，然而有人却这样考虑过。斯蒂芬·A·道格拉斯同林肯曾进行过一系列的辩论。我们在其中的一篇演说中发现了一个异想天开的预言。其实它倒很能说明问题，道格拉斯曾是民主党内“青年美国”运动的领袖，这个运

动曾赞同过，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吞并墨西哥、古巴以及中美洲国家。

“让每个州依照伟大的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坚定地站立起来”，道格拉斯叫嚷道，“让每个州独立行使各自的职权，别去干涉邻州的事务，那么，在这个问题上，麻烦就能避免。如果我们能遵守这个原则，那么林肯先生会发现，一个由我们的先辈所创建的，根据各州人民的意志决定的，既有废除奴隶制的州又有实行奴隶制的州所组成的共和国将永远生存下去。在这伟大的原则指导下，我们就能一如既往地继续前进，创造更多的财富、增添人口，增强国力，以及增加形成一个伟大国家所需的一切因素。这样，全世界都会羡慕我们，乃至恐惧我们，随着人口的增长我们就会不断壮大，因此我们就需要更多的空间，直到我们使这个大陆成为一个单一的为大洋所环绕的共和国为止。按照这个原则，美国就能完成这种伟大的使命，这是上帝为我们安排的命运。按照这个原则，我们可以万无一失地接收从旧世界源源涌向新世界的智慧之流，它将遍布我们的草原，清除我们的荒野，建起城镇，架起铁路，并给国家建设带来其他许许多多的益处，从而使我国成为全世界被压迫者的庇护所。我们肩负着这么伟大的使命，而这一切也只能有赖于忠实遵循自治政府的原则才能得以完成，而我们整套制度就是建立在这个自治政府原则的基础之上的。”请注意，他认为美国的扩大是一种善行和恩惠，还认为我们的目标是为全世界所有被压迫的人们提供庇护。这种利他主义的自我表白早已成为我们的既定政策。无论何时我们进行战争或者入侵别国，总是为了去解放什么人。

再来看看我们进一步的扩张。我们占领了美洲大陆一大片土地之后，又从俄国人手中买下了阿拉斯加，并开始把手伸向太平洋和加勒比海的岛屿。我们攫取了中途岛，由于害怕夏威夷和萨摩亚群岛被其他大国占领，我们在那里建立起海军基地。我们对古

巴垂涎已久，到了 1898 年，虽然西班牙显然已准备同我们谈判，可是我们还是向他们发出了最后通牒，要他们从该岛撤离。战舰《缅因州号》的沉没直接触发了这一事件——尽管说西班牙人干了这件事从来就没有什么根据，而现在却有相当的理由认为那是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一手策划的，目的是要发动一场战争。然而在我们入侵古巴以前，我们就曾把海军上将杜威派往当时属于西班牙的菲律宾，去击溃马尼拉海湾的西班牙战舰——很明显，这是由当时任海军副部长的扩张主义分子西奥多·罗斯福导演的，而官方也没有正当理由能够解释这一行动。后来，我们把正规部队开进菲律宾，攻占了马尼拉城。我们同西班牙人为古巴问题发生了争吵，据说其根源是古巴人挑起了斗争，把西班牙人赶走，而与美国在菲律宾的辉煌战果毫不相干。古巴人的斗争自 1868 年以来一直没有中断，直到离那时不远发展到古巴人的一次起义遭到残酷的镇压。我们把西班牙人赶出了古巴，战斗中我们只牺牲了 300 名士兵，而病死的倒有 3,000。我们又夺取了波多黎各，关岛和夏威夷群岛，可是在菲律宾，我们遇到了更多的麻烦。菲律宾人的反抗为的是推翻西班牙统治，他们原先以为我们的干预是无私的，可是当他们发现我们有意并吞他们的群岛，他们就转而抵抗我们了。我们花了 2 年多的时间才把他们压服，派出的 7 万士兵中死了 3,500。我们建立了集中营，当年西班牙在古巴也建造过同样类型的集中营，而我们曾为此而愤慨不已。菲律宾人的伤亡人数是我们的 15 至 20 倍之多，其中大多数是平民百姓，我们总共付给西班牙 2000 万美元。后来，西奥多·罗斯福当了总统；他在巴拿马策划了一场旨在脱离哥伦比亚的革命，因为哥伦比亚拒绝接受我们所提出的租用巴拿马运河区的条件。后来我们向巴拿马租借了运河区，给了巴拿马一个半隶属美国的保护国的地位，步了古巴的后尘。不久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哥伦比亚对此极为不满，于是就采取了一条使美国商人难以

取得租界的政策进行报复。到 1921 年止，我们一共付给哥伦比亚 2,500 万美元。

俾斯麦统一了德国，使之成为一个欧洲强国。1914 年，它开始入侵它的邻国，德国的主要劲敌英国接受了挑战，在欧洲大陆上同它交锋。英国和德国都侵害了美国认为它应该享有的中立国的权利。英国人封锁了美国的贸易，扣押美国的船只，把他们怀疑同德国做有关系的美国商行列入了黑名单。德国人发动了潜艇战。尽管德国人曾警告过美国人不要搭乘与德国为敌的国家的船只，但结果在潜艇战中还是有许多美国人丧生。最后，德国发展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它的潜艇在某些海域里不加区别地攻击起所有的商船。我们受到了英国大量宣传的影响，被传闻中的德国人的暴行吓坏了。尽管如此，我们同德国仍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在整个 19 世纪，我们对德国人表示出最高的敬意。然而，我们终于站到了英国这一边，并把英国争夺霸权的斗争当作是我们自己的斗争。如果没有我们的介入，这场战争的时间可能会大大缩短，欧洲也许可以少受破坏而变得比较稳定一些。这次卷入使我们丧失了 5 万人的生命，约占去整场战争阵亡人数的 1/6。在我国国内，凡是德国的人和物，都遭到了劫难。我国人口中有许多德裔公民，过去他们一向被认为是我国最宝贵的组成部分之一。与此同时对任何的不同意见都进行了压制和迫害，比林肯的镇压手段有过之而无不及。威尔逊总统曾尽了极大的努力使我们不卷入战争，而最后，他把我们带进战争时宣告说我们所针对的并不是德国人民，而是那些煽动德国人民干坏事的军阀；可是一旦他站到了欧洲同盟国的一边，他就身不由己地跟着迫使敌人毫无必要地无条件投降，并对他们强加种种重罚，以致与德国再次作战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据乔治·F·凯南说，导演这第二次战争的是一头名符其实的“柏林野兽”，而不是那个我们曾不公正地把他当作野兽的那个昏庸的德国皇帝。这次战争爆发时我们逐渐地不知不觉地被卷了